

徐文博

石钟扬

戴名世论稿

黄山书社

1085232

目 录

一、戴名世所处的时代·····	(1)
二、戴名世生平及其著作·····	(16)
三、“《南山集》案”始末·····	(32)
四、戴名世的古文理论·····	(49)
五、戴名世的古文成就·····	(73)
六、戴名世与“桐城派”·····	(95)
七、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117)
八、戴名世的史学实践·····	(132)
附录：戴南山先生年谱····· 戴钧衡	(153)

一、戴名世所处的时代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因其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清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三月十八日，戴名世出生于安徽桐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二月十日，因“《南山集》案”被害于北京，居世整整六十个春秋。

历史上一位先进思想家的出现，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那么，戴名世所处的时代到底有哪些特点？戴名世又是怎样认识和对待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呢？这对考察戴名世这个历史人物至关重要。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封建统治集团内的开明分子，还曾对封建制度本身的种种弊病，做过一些调整和改革工作，那么，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即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一些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都被大地主、大官僚的倒行逆施所践踏，封建制度固有的腐朽性和反动性逐渐暴露无遗。这种腐朽与反动首先表现为整个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非但皇帝奢侈、荒淫之情惊人，就是大官宦也是“人务奔竞，苞苴恣行”（《弇州史断后集·赵南星传》），达到贪得无厌、穷凶极恶的地步。明代后期，明神宗最小的开销是宫女的胭脂费，每年竟用白银四十万两。他荒淫无度，吸毒竟至中风，岂能再问朝政？熹宗统治时的宦官魏忠贤，其“所积财

半盗内帑……可裕九边数岁之饷”（《明史·樊玉衡传》），而且竟自妄称是仅次于皇帝的九千九百岁。皇帝的不理朝政和宦官的擅权，其结果只能是“背公植党，逐嗜乞怜”（《明史·陈登云传》），置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死活而不顾。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总是伴随着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明末，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除借助于巧立名目的勒索和抢夺外，还年复一年地在既有税收的限额上强行加派，使田赋、徭役高达空前的程度。当时，仅镇压农民起义用的“剿饷”，练兵用的“练饷”，与满洲贵族打仗使用的“辽饷”，即超过全国正赋的数倍。这种肆无忌惮的加派，经大地主的转嫁，其沉重负担完全落在本来就啼饥号寒的贫苦农民身上。土地高度集中在大贵族、大地主手中，自耕农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的贫富悬殊现象。跟着而来的则是农民的赤贫，他们在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之下，只有当佃户、作雇工的道路可走，甚至“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沦为奴仆。整个社会也“如同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广大地区竟出现了“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黄尘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的惨象。到了清初，社会更陷入“农空、工空、市空、士空”的困敝局面。当时，“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潜书·富民》），“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亭林文集·钱粮论》）。封建社会的危机，在其日趋崩溃的历史行程中，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新时期”来临的征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 782—783页)。明末清初封建经济结构濒临瓦解,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正在一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孕育和和萌发着。当时, 松江、芜湖、金华、温州等地的纺织业, 已从农业中分离而独立出来; 江西的瓷业, 两广的冶铁, 山西等地的采煤, 不但拥有大量的技术工人, 而且出现了精细的分工; 徽商、苏商等商帮的出现和发展, 南京、北京、淮阴等都市的扩大, 也无一不标志着商品经济正在兴起。与此同时, 在杭州、松江、海南等地, 相继出现了变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的趋势, 它无疑是农民分化的反映, 说明了农民的产品已经开始转化为流通的商品。这一切虽然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罅隙中产生的, 其本身也还极其脆弱, 而且经常遭到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 但是, 它却在默默地推动历史的前进, 给人们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

这种社会现实, 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戴名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思想。戴名世祖籍新安, 其家庭在明初洪武年间迁往桐城。在其后的三百年中, 经历了一个由盛至衰的变迁。原来是一个“以诗书孝弟世其家”、“支属蕃衍”的望族(《芥舟翁寿序》), 以后竟“家世零落”, “因鬻卖田宅, 遂零散而不复起”(《戴母汤太孺人寿序》), 直至“无数顷之田, 一亩之宫, 以托其身”的困境(《与弟书》)。到了戴名世略识世务的时候, 甚至因其父辈财产分配的不均, 而出现了“人伦之患”(《种树说》)。对此, 戴名世“不无感慨忿恚”(《与何屺瞻书》), 苦闷异常。但是, “盛衰消息之际, 盖家家为然”, 他清醒地认识到“衰微已甚”(《芥舟翁寿序》)的惨状, 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因此, 他说: “明之士民, 死于饥馑 死于盗贼、死于水火……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1]并为此而“喟然三叹”

（《王学箕传》）。

戴名世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明末清初是一个“五行之乖殄”、“阴阳之颠倒”、“元气之败坏”（《忧庵记》）的“败坏之世”，整个社会是一座充满着危机和黑暗的“忧庵”。在这个社会里，“富者为贤，不富者为愚；富者为贵，不富者为贱”（《书〈货殖传〉后》），其秩序已经紊乱，基础已经腐朽，连是非观念、伦理原则也随之丧失殆尽。

明末清初的社会何以会“衰退”至如此地步呢？在戴名世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吏治的堕落。他说：

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以故民愈困而官愈贵，相习不以为非久矣！（《艰贞叟传》）

因此，他对吏治的丑恶和腐朽，进行了切齿的诅咒：

今也一介之士，乘传捧符而来，无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事恣睢之意，盖子女玉帛，其尽于刀笔筐篋之间者，不知其几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所止。

（《送王序纶之任婺源序》）

在戴名世看来，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群“恣侵暴，剝穷孤”的“羊狠狼贪之徒”，他们本为“挺土刻木”，“而强自冠带”（《钱神问对》），平时“以门户相争”为擅长，一旦“天下多故……计唯有逃耳”（《薛大观传》），竟至“贪以亡国”。所以戴名世说：“此其罪甚于盗贼万万！”（《予遗录自序》）吏治的本质及其给社会造成的恶果，得到了透彻的揭示和无情的鞭挞。

如果说，戴名世视吏道的腐朽，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出现颓势，那么，其间接原因，他则认为是科举制度的反动。

关于这一点，戴名世不止一次地指出：

自科举之制兴……而风俗之颓，人才之不振，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送刘继庄还洞庭序》）

今夫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数十百年以来，天下受讲章时文之余毒，而后之踵之者愈甚，而世愈坏！（《赠刘言洁序》）

明代，规定了以八股制艺取士的制度，要求应试者按照八股文的固定格式，填写固定的思想内容，非“代圣人立言”而不取。其结果，只能是褻读文章，禁锢思想，摧残人才，而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驯服的奴才。到了明朝末年，上层统治集团几乎全部为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所把持。戴名世曾说：

（有明）二百余年以来，上之所以宠进士，与进士之荣光而自得者，可不谓至乎？然而卒亡明者，进士也。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及其成进士，为达官，座主门生，同年故旧，纠合蟠结，相依为声势，以蠹国家，而取富贵，……天下之势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一时进士，气焰薰灼，无几何，已与宗社俱烬。（《三山存业序》）

明朝末年的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成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明朝的政权恰恰败毁在他们的手中。

吏治和科举，是整个封建制度的两股支撑力量，支柱已经腐朽，大厦倾覆也将成为必然的趋势。戴名世正是基于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才会“有王者起”（《赠刘言洁序》）的呼唤。这种变革现实的强烈要求，正是戴名世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戴名世曾经“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与弟

书》），“二十余年，忧愁穷苦”（《答朱生书》），其境遇可谓困顿。但是，他“不以一己之命为命，而以天下之命为命”（《命说》），面对忧患“无之而不在”的现实（《忧庵记》），倾吐出“欲尽庇天下人，使无失其所养”（《种树说》）的抱负，希望以天下大同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穷富悬殊的矛盾。为此，他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展现一个理想的世界：

居民千余家，淳淳闷闷，浑乎太古之意；桑麻林麓，远近映带；婚姻嫁娶，不出其里。居人自其始祖迄今，无一识字读书。县吏一来征租，信宿尽取而去。子孙历世，无一入城市。家家足衣食，无贵无贱，无贫无富。凡器竞凌害，偷盗讼狱，干戈扰攘之事，离别羁旅之苦，父老子孙，传至数十，耳未尝闻！（《蓼庄图记》）

戴名世的憧憬，虽然最终必堕入无法实现的空想，但其中的“无贵无贱，无贫无富”的平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二

戴名世称之为令“海内寒心”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袭击下覆灭了。可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戴名世所希望的“王者兴”，而是清人入关，统治中原。1644年3月19日，发难于陕北，辗转于陕西、河南、湖北、山西、河北等地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活动于淮、川、汉一带的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有力配合下，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攻进明都北京城，迫使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完成了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使命。但是，就在李自成建立大顺国

政权的第二天（1644年4月30日），清兵在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勾引与配合下，以武力攻入北京，建立了以清贵族为核心的清政权。这一突然的变化，不仅使在社会上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增添了民族斗争的内容，而且使戴名世那个已见衰落的家庭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从而直接影响了十年后出世的戴名世的社会政治倾向。

用戴名世的话来说，他那个在封建社会颓势的影响下“遂一败而不复起”的家庭，是在“明崇祯中，遭贼乱家破”（《砚庄记》），即于一六三五年张献忠部围困桐城时遭到彻底破产的。由于阶级的局限和自身的仇恨，戴名世在其早年，对农民起义军曾有过“可杀而不可抚”（《抚盗论》）的仇视态度。但是，就明清之际社会变革对戴名世的影响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其家庭主要成员的故国情思。他的曾祖父戴孟庵，“当鼎革之际，痛哭入山不出”（《张天閒先生八十寿序》），“隐于龙眠山中”（《响雪亭记》）；他的祖父戴古山，于明末任职江西，在改朝换代中“宦游不遂，罢归里居”，数十年中，唯以酒度日，直至隐逸而终；他的父亲戴霜崖，“为人醇厚忠谨”，因故国沦亡，“顾内自忧思刻苦”（《先君序略》），无一日忘怀朱明王朝，因此，甚至可能参加过舒、庐一带的“复社”的反清活动。最后，因抑郁不遂，凄凉地死在桐城陈家洲（现属枞阳县）的教馆之内。临终对戴名世语重心长地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子，然勿效我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田，他担心这将会酿成后患，因而有“勿效我忧”的告诫。上三代在国破家亡后所走的道路固然略异，但是纪念国恨、忘却家仇的态度却极为一致。戴名世身为大清的臣民，对其先辈的情怀虽然只能述而不论，难作明评，其景仰

之情，肯定之意，却极为明显，并因此左右着他对清初政权的看法和态度。

清贵族入主中原，伴随着剑与火的争斗、血与泪的苦难。当时的汉族人民，其中包括地主阶级的部分人物，或由于维护既得的利益，或出于对故国的怀念，或受传统的“夷夏大防”的观念的影响，或不堪忍受异族歧视的苦痛，纷纷以多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反抗。这样，在戴名世出世前后的近四十年内，便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的斗争。从战场上来说，远的不仅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的出现，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来亨、李定国等也调转矛头直指清廷；近的则有明御史金声和秀才江天一的休宁起义，吴应箕、尹民兴的贵池举兵。戴名世的家乡桐城附近，在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九年这十年内，也有周损等拥戴明宗室朱统𪔐的结寨抗衡。在思想领域里，有的著书以寄情怀，委婉地表达对故明的思念；有的隐而不仕，拒绝与清廷合作；有的暗结组织，筹划反清的计谋。对这些此起彼伏，前仆后继的斗争，戴名世或耳濡目染，或潜心究讨，并且表示了极其鲜明的态度。戴名世的出发点，已不同于前朝遗民旧臣复活故明的企求与努力，也不象自己的先人及先辈思想家那样为亡明唱挽歌，更不准备为朱家王朝殉葬，而是从总结历史是非着眼，以一种冷峻和严肃的态度，为几千年来蓄积而成的民族精神张目。因此，戴名世特别推崇明末清初人民的斗争精神和他们对祖国的赤子之心。这种推崇，又往往是在对普通老百姓与前朝“进士”、“九卿”的比较中得出来的。所以，它不仅寄托了戴名世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由此表现出可贵的平民观念。他在为当时的一位抗清妇女作传时说：

当是时……虽有数百年故国，威灵震薄海内，而一旦九庙隳，子孙夷，彼公侯将相，跨州连郡，曾未闻有一如节妇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线之绪，而使之复兴，岂不悲哉！（《周烈妇传》）

又如，他在叙述一个小贩和一个贫士为抗清而死的经过以后说：

大兵（清兵）之初入关也，淄川人孙之灏即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俱已效国（清）装。之灏在明时，官列九卿；而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吴江两节妇传》）

戴名世能够如此地把周烈妇同亡明的公侯将相进行比较，写出死而不悔的小贩与贫士同上表归诚的孙之灏在改换服装上的不同态度，说明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反对民族压迫中的巨大力量，意识到民族的正气不是孙之灏之类的公侯将相所能有，而浩然于“一介之士”、“里巷之氓”的身上。正是这种可贵的平民思想，使他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正确地把握住清初所出现的民族斗争的主流，旗帜鲜明地讴歌人民的正义行动。

在这种思想主导之下，他不仅以清兵入关所造成的大量灾难性事实，揭露了清统治者所标榜的“救民于水火”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谎言，指出清贵族所宣扬的“出薄海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的国策，给人民带来的只是“尸积城下者累累，皆糜烂不可辨认”（《吴江两节妇传》）的惨痛恶果。而且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客观形势出发，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抛却了自己的阶级偏见，一改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承认他们“皆国家之赤子”（《子

遗录自序》），将曾经被自己视为对立的力量，纳入自己所同情的对象之内。对坚持西南地区抗清活动达二十余年的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队伍，他更推崇之至，在赞赏他们的延续“国家之祭号”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深叹永历诸臣之不能用”，严厉地指斥了地主阶级抗清人物对待农民起义军的错误态度。戴名世目光向下的精神，使他在观察复杂的民族问题时，能够以一种与当时的士大夫迥然不同的姿态，在社会的底层发掘民族精神的真正所在。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戴名世的地主阶级立场已经彻底改变。但是，他能够从平民的角度来总结大规模民族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戴名世对农民起义军看法的改变，还多少存在着迫于民族斗争形势的因素，那么，在清政权巩固之后，继续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批判残存的奴役政策，则是出于他的自觉行动了。康熙统治的初中期，西南地区经常发生民族纠纷，特别是聚居的苗民，不时地有兴兵自保之举。由于清初所执行的民族奴役政策的影响，和部分地方官员大民族思想作祟，对苗民的行动往往错误地作出梗顽不化、蓄意谋叛的结论。对此，戴名世却大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苗民起事，纯属地方官员为非作歹的行为所致。他说：

其镇守官兵，刮苗之所有，常无故入其境，夺其牛马。苗忿恨，遂四出为害。

清官员频调兵将，对苗民大加挞伐，戴名世却说：

（苗民）标技野鹿，尚如洪荒之世，未经开辟，此亦天地间之缺陷。

因此，在对待苗民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与清统治者所执

行的武力镇压政策截然相反的主张：

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礼，颁之以冠昏丧祭之制，立之以党庠术序、旌善惩恶之法，其蚕丛鸟道，通其百工技艺……胥标技野鹿而衣冠文物之。（《记红苗事》）

苗民既然无罪可伐，当时，对他们来说，封建文化又属于先进文化，所以，戴名世的主张尽管难免有同化的痕迹，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都是基于大小民族平等和全社会解放的要求。戴名世的民族观，非但与清初统治者所执行的民族奴役政策相牴牾，同时也明显地有别于一切大民族主义者，显示出近代思想的一些特点，因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闪现出奇光异彩。

三

戴名世对明末清初的“败坏之世”深恶痛绝，由于“愤世之变”、“嫉俗之衰”，在变革现实要求中，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启蒙主义倾向。但是，在预测社会前进的方向，探索变革现实的途径的时候，他却只能重复儒家的理论，企求所谓的贤明政治的再现。关于这一点，从他以主客对话的形式所阐述的主张中，可以得到确凿无误的证明。他在《忧庵记》中写道：

客曰：是为有忧疾矣。吾请为子治之：吾将以泰华为莞簟而寝子，以江海为羹汤而饮子，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为之医，以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为之调剂，以井田、学校、封建为之药饵，以仲尼、孟轲为之针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

要了解戴名世所开列的药方的内涵，必须从明清之际学术界掀起的关于政治制度大讨论这一背景来考察。当时，由

于封建制度发展到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程度，先辈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土地因兼并而高度集中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主张以教育的革新来促进人才的培养，给政界注入新的血液。戴名世承此而起，倡“井田”，实则是主“均田”，意在解决现实生活中土地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弊端；办“学校”，无非是为了取代生员制度，矛头指向八股时文；其分封之议，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这无异于几把锋利的匕首，无不猛击其要害。不过，就整个改革方案的实质来说，尽管经过苦心孤诣的设计，也只能是封建社会开明政治的光环和原始乐园的幻影这两者的杂凑，而难有新的突破。事实上，戴名世立身处世的原则，乃至观察事物的标准，也无一不深深地刻上正统的封建观念的印记，而表现为对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的根本维护。他认为“世道之敝”，只是因为“正人在位者”“相继复灭”（《左忠毅公传》），统治阶级内部“不复有备志之人”；他肯定南明诸王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只是“揆以春秋之义”（《与余生书》），即根据封建的正统观所作出的抉择。他对烈女、节妇的歌颂，则完全为了张扬封建伦理道德。这些情况说明，戴名世对现实社会的解剖，勇气百倍，一针见血，不留余地。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旦为社会寻找出路，戴名世就无法提出一种崭新的理论，而只能把眼光投射于往昔，向往远古，托言三代，以重现唐虞之世为最高理想，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极限。由于戴名世的社会观具有彻底否定现实和固守旧的政治规范这二重性的特点，一旦面临突发性的转变，他的思想就可能会产生剧烈的反映，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果断的抉择，要么冲破固有的阶级属

性，从启蒙思想的胚胎和幼芽中孕育出一个民主思想体系，在对既成社会的否定中成为一位呼唤新制度诞生的先驱者；要么转而与封建的执政者相配合，成为一个既定制度的维护者。因此，清政府在全国取得实际统治权后所采取的政策，对戴名世的思想发展将至关重要。

戴名世所经历的康熙时代，是一个由乱到治、变动荡为稳定的时代。首先，在镇压了全国性的民族反抗运动以后，清政府又以重点打击、分兵会剿的策略，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打击了割据势力，强化了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接着，又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安定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骚动，将台湾置于祖国的有效控制之下，特别是迫使沙俄侵略者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保卫了黑龙江流域的国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与此同时，清政府有鉴于朱明政权覆灭的教训，在内政方面，也推行了诸如整饬吏治、笼络人才、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等旨在革除弊端、缓和矛盾的措施。这样，竟使没落的封建制度在康熙年间出现了迴光返照的局面。

“康熙盛世”的出现，首先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所掀起的巨大冲击，造成了封建性生产结构的松弛，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是以康熙为代表的、刚刚从奴隶制跃入封建制的处于上升时期的满族势力，对关内已经腐朽的汉族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戴名世无法作出这样的解释，然而，社会的发展，康熙的成绩，却为他所目睹。实际情况较之明末乃至清初社会皆有长足进步。因此，他对社会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一桩可以理解的事了。只不过，因为他曾经反对过当朝的统治，当时又无法对自己的思想演变作出恰当的解释，因

此，他就很自然地以一种“自全”的形式表现出来。康熙四十一年，亦即戴名世五十一岁的时候，他曾经说：

当明之既亡，东南遗民，义不忍忘故国，多有愚昧以触罪戾，至于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坛、丹徒、宣城三县士大夫受祸尤烈。先生独超然远览，自全于耕凿之间，可不谓智勇绝人者乎！（《沈寿民传》）

在这里，一方面，清初的人民民族精神继续得到肯定；另一方面，恢复明朝宗祀的行动却被视为“愚昧”之举而加以否定。由此可见，从慷慨激昂中冷静下来的戴名世，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能够对过往的历史作出更近于科学的分析。它表现的是一种“保身自全”，实际上则是戴名世处世态度改变以后，对自己过往的反清思想的一种体面的反省。这种反省，是他顺应时代潮流，改变既定观点，在思想上与清政府合作的自然反映，一旦表现在实际行动之中，就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调了。这虽然是另行撰文阐述的问题，但因为它说明了戴名世的社会观的变化与康熙时代的社会进步有其一致性，而不是“地主士大夫的软弱性和复国无望后那种消极的情绪”（贺珏：《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的反映，所以，有必要提出来略加辨析，以求得一种相对客观的认识。

戴名世社会观的形成、演变和发展，除了受到正统的封建思想体系的制约和时代变迁的影响外，最根本的还是他所从属的阶级地位的作用。戴名世曾经要“从老农老圃而师”（《田有字说》），实际上，这只能说明他对下层人民有着一定的同情，或者说，他曾经与农村生活有过接触，而不能认为他的出身已经赤贫。戴名世自己曾说，他最困难的时候，尚可“授徒他方，以糊其口”（《砚庄记》）；到了中

年，聊有积蓄，即打算种树养生，雇工耕作，自己作主人（《种树记》）。可见，其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都反映了小地主的属性和要求，显示了鲜明的剥削阶级的色彩。明末清初朝代不同，最高统治者的族属有别，但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权性质却是一致的。戴名世之所以首先激烈地反对清廷，嗣后又转而拥护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熙实施了一些兼顾中小地主利益，甚至是抚慰农民的办法。就戴名世本人来说，其前后态度并非矛盾，而是一脉相承的。